

中 央 研 究 院  
三 民 主 義 研 究 所

# 專 題 選 刊

(三十九)

## 大衆傳播媒介結構與決策系統 互動關係之研究

李 錫 錕

中 華 民 國

臺 灣 臺 北 南 港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 大眾傳播媒介結構與決策系統互動關係之研究

## 目 錄

第一章 導 言	1
第二章 現代大眾傳播媒介結構與決策系統互動的演化過程	3
第一節 近代國家整合的特性之一——群眾政治地位的奠定	3
第二節 現代大眾傳播媒介的角色與功能	7
第三節 現代大眾傳播媒介的普及性及影響力	12
第三章 大眾傳播媒介與決策系統的互相依賴與衝突	17
第一節 大眾傳播媒介與決策系統的互相依賴：阿蒙模型的適用及評估	17
第二節 大眾傳播媒介與決策系統功能上衝突之必然性	24
第三節 人性的不滿現狀所導致的媒介與決策系統的衝突	28
第四章 結論：今後的研究方向及重點	33

# 大眾傳播媒介結構與決策系統 互動關係之研究\*

李 錫 錕

## 第一章 導 言

大眾傳播媒介被視為一個結構、利益團體或次系統，在國家政治系統中運作，和其他的結構發生互動關係，影響決策行爲，這是六〇年代以後開始被學者重視的研究重點。六〇年代的幾個突出的現象如新興國家的大量出現，電視台的普及與隨之而來的廣告膨脹，國際電信及衛星轉播系統的發達等等，不但使國家系統化，連世界似乎都可以被概念化爲國際政治系統了。在這種系統之中，大眾傳播媒介結構與決策系統之間的互爲依賴、衝突、妥協等關係，無不相當地影響了整個系統的運作。

在上述脈絡關係之內，有關大眾傳播媒介（以下簡稱媒介）與政治的關係的研究目前仍在開始階段。許多理論已經逐漸在被發展或建立，例如 Melvin DeFleur

---

\*本研究承蒙袁教授頌西、易教授君博費心指正，謹此致謝。

的大眾傳播理論( *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 ( 1966 )，其所借用的學術領域極為廣泛，諸如組織理論( *organizational theory* )、象徵互動主義(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社會心理( *social psychiatry* )、衝突理論( *conflict theory* )、分離理論( *disengagement theory* )及一般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等。〔註一〕 由於既存文獻及理論的不足，許多基礎性的資料( 如有關媒介對投票行為的影響的統計等 ) 也顯得不夠物盡其用；尤其涉及個人或集體行為的模式等問題，甚至連資料搜集亦感困難，而這些行為模式却極度支配了媒介與決策系統的關係。

本研究的目的是為：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觀察、解釋、分析媒介在決策系統中的角色，俾對現代政治系統的運作情形有更多的瞭解。本研究先追溯現代媒介的來源及其演化過程，以利吾人掌握其運作的特徵。其次，從媒介結構與決策系統在功能上的衝突現象中，吾人不難體會現代民主政治系統的基本原則，可供我國實施憲政之參考。

從三民主義理論架構觀之，本研究應屬於民權主義之範疇。孫中山先生一再強調歐美三權分立的弊病，時至今日，情況並未改善；實際上，媒介結構之所以在決策系統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加而被戲稱為「第四分支」( *the Fourth Branch* )，便肯定了孫中山先生的診斷。本研究假設：現代歐美各民主政治國家的決策系統便是太有「能」，過度的「能」進而侵犯到人民的「權」，使人民的「權」逐漸受到威脅，媒介遂應運而生，被許為民權的維護者，俾與決策系統相抗衡，以彌補立法司法功能之不足。但是問題未必因此而解決。媒介一旦能力增大而成為一種舉足輕重的次系統或利益團體，却逐漸淪為被特殊利益結構所控制，傾向於為少數人服務，減低了它被群眾所期望的功能。並且由於它代表群眾政治權利的具體化，決策系統欲加干涉而有所顧忌，使它幾乎成為不受拘束的權威機構，無形中支配了系統的決策過程。研究現代媒介與決策系統的互動關係，有助於吾人瞭解在決策過程中如何保障人民的「權」而不妨礙政府的「能」，達到孫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中

所提倡的「權能分開」的政治功效。

## 第二章 現代大眾傳播媒介結構與決策系統互動的演化過程

### 第一節 近代國家整合的特性之一——群眾政治地位的奠定

現代媒介結構被認為導源於十九世紀西歐社會和政治現象的革命與演化，這種革命與演化和科技的發展互為影響，終而造成現代無所不在的溝通系統。其中最重要的革命與演化性的現象之一就是國家的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它不但奠定了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國家的基礎，更塑造了世界上大部分政治結構的形式和功能。

近代西歐國家整合的特點之一是「群眾」（*the masses*）的利益成為政治過程中的合法輸入（*legitimate input*）；換言之，即人民群眾可參與決策過程（不論是直接或間接途徑）的民主政治，而不是古代雅典的貴族民主政治。不可否認地，這種平民參政至今仍是概念或神話（*myth*）多於實際表現。最初是思想家的鼓吹及中堅分子的同情多於群眾的喧嚷；一旦群眾的意識覺醒，所得到的民權也非常有限。遲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政府才全面解除財產、性別、種族等限制，平民才算是獲得較完整意義的參政。

平民參政可謂人類政治歷史上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其根源應追溯至中古末期的政教鬥爭。由於教會層級節制的衰微，當時歐洲各國的君主極力要打擊教權，建立屬於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政治地位。在這種權力爭奪的過程中，由平民出身的中產階級（即 *bourgeoisie*）逐漸成為決定性的政治籌碼。民族國家建立初期，當君王們挾君權神授的理論鞏固統治權威，遭到貴族階級的反抗時，中產階級是君主最重要的盟友。從社會層級的觀點看，這個時期遂成為君主挾中產階級和貴族對抗的形勢。

中產階級一旦在政治過程中獲得被承認的影響力，除了在有形的政治結構中發揮功能（如充任宮廷的顧問、君主的財務助理及其他非正式的關係等）之外，更重要的是本身產生了使這種功能正當化及增強的意識形態（如理性主義、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等思想）。中產階級日益壯大的實力加上意識形態的覺醒，使君王和前者之間權宜的結合逐漸瓦解，君主權威面臨貴族以後的平民的威脅。英國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的共和政權可以說是歐洲君權式微的象徵，以及平民政治地位合法化的濫觴。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所建立的議會（**Parliament**）正式成為國家最高的政治權威，君權大受限制，中產階級與貴族並列為政治過程中的合法輸入。法國顯然沒有達到英國式的妥協，君主、貴族、中產階級之間的對立繼續惡化；直到大革命爆發，才跟隨英國的模式，建立了一個中產階級地位相當地獲得確認的共和國。共和國也於焉成為歐洲普遍的國家政體。

1789年的法國革命在政治意義上是介於中產階級與貴族的權力爭奪：擁有實際權力的中產階級企圖推翻擁有機構地位（**institutional positions**）的貴族。當議會（**the General Assembly**）成立之後，中產階級號召了平民群眾，企圖給貴族最後的致命打擊（**coup de grace**）。令人意外的是，這個最後的致命打擊產生了具有歷史性的後遺症：中產階級的革命迅速變質為平民革命，建立在封建特權為基礎之上的既存結構及秩序土崩瓦解；革命初期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愛的信仰淪為群眾毫無忌憚地發揮貪婪、仇恨、嫉妒的合法藉口。〔註二〕 在一片紛亂暴動的局勢之中，群眾第一次嚐到政治權力的滋味，這種局勢是亞里斯多德曾經討論過但可能沒有經歷過的。〔註三〕

拿破崙的崛起可以說象徵著平民權力的具體化；或者按亞里斯多德式的說法，是暴民政治的領導者；按法國人民的稱呼，他是革命之子（**the son of revolution**）。為了統治的方便，拿氏政權固然恢復並加強封建及帝制，但是他所倡導的法律的平等適用、機會均等、用人惟才、榮譽軍團（**Legion of Honor**）等措施無不是帶有濃厚色彩的平民地位的肯定。這種肯定帶來的影響力是不可低估的，如威爾杜

蘭 ( Will Durant ) 在「文明的故事」 (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 中所言，法國大革命固然摧毀了舊的政治和父兄權威 ( 此處指 *ancien regime* )，打擊了宗教信仰，却啓發了法國人民「個人自我的直覺」 ( *individualistic instincts* )。〔註四〕這種「個人自我的直覺」係屬於一種覺醒的群衆的意識，已經不是任何權威可以有效地壓制。到這個階段的發展，大衆社會 ( *the mass society* ) 可以說已經成形了。

拿破崙的平民根源具有極大的政治意義。當時歐洲群衆對他的權威及光榮所給子的病態的偶像化崇拜，未嘗不是反映他們反貴族的革命的成功所獲得的滿足感，將這種滿足感投射在拿氏個人身上。在群衆意識的脈絡關係之內，拿破崙不僅是一個個人，且是一個政治結構，它成功地執行了封建層級社會系統中平民地位再界定的功能。拿氏政權固然迅速爲全歐洲貴族聯盟所推翻，且拿氏以後歐洲再無第二個平民皇帝；〔註五〕但是在另一方面來說，歐洲的封建勢力也相對大減，此後即再無路易十四「朕即國家」那類權威之王，而是趨向以貴族與中產階級 ( 即平民社會流動的結果之一 ) 妥協爲骨幹的政治多元化的民主國家。

同時，工業革命的後遺症之一是貴族勢力被迫作更多的讓步，使歐洲加速演化爲大衆社會。科技的進步促進工商業的擴張及教育的普及 ( 教育乃喚起自我瞭解意識的最有效的工具 )，也加深了社會階層的明顯區分——一方面是控制大多數財富及權力的貴族或資本家，一方面則是被既存秩序所束縛的中產階級及貧苦勞工。由於這是一種史無前例的局勢，各種病態的政治社會現象如商品惡性競爭、生產盲目擴張、勞力剝削、勞資對立等幾乎使當時西歐各國決策當局束手無策。在這種充滿混亂及敵意的氣氛中，激烈的知識分子率先號召反抗既得利益 ( *anti-establishment* )，群衆起而附和，很頻繁地採取所謂異態的 ( *anomic* ) 利益傳達活動。對於當時西歐資本主義政治系統的決策者而言，可能由於法國革命的可怕的教訓令人難忘，他們不再重蹈十八世紀末期 *ancien regime* 中堅分子拒絕妥協而導致系統瓦解的覆轍；〔註六〕面對著日益壯大的群衆示威，採取了極具反應性 ( *responsiveness* )

的妥協，使群眾的地位逐漸獲得制度化的保障。即使這種極具反應性的妥協是雷聲大雨點小，至少不是口惠而實不至。在系統產生功能失調（dysfunctional）時，一旦上層結構願意進行改革，妥協的管道開始被發展與設立，被啓蒙的（enlightened）下層結構在面臨可預計的繁榮與不可測的冒險的兩個抉擇時，通常都會有理性地、耐性地等待。無可否認，群眾地位在政治過程中獲得合法性而沒有中斷系統穩定的連續性，這是近代西方國家整合過程中不可低估的成就。

總之，近代西方國家整合的遺產（legacy）之一是提供了一個解決利益衝突的機構（mechanism），在這個機構中，社會階層的利益大致能夠運用某種溝通管道來傳達，以便對系統提出要求或支持。即在這種執行妥協的機構之中，溝通管道之一的大眾傳播媒介遂演化至今日的形態。顧名思義，何以被稱為「大眾」傳播媒介？因為它隱含著對群眾利益的關切，「打擊富貴，安慰貧賤」的傳統責任。〔註七〕

但是由於妥協功能的存在，富貴與貧賤却能夠共存共榮。在妥協的過程中，難免有時候功能不足，導致富貴與貧賤衝突的惡化，威脅了系統內部的結構均勢（structural equilibrium）（例如1848年的巴黎公社暴動）。但是大體言之，這種保障群眾利益的國家整合所建立的「惡中之善」（lesser of evils）的架構極有助於近代西方國家的穩定與繁榮。

就認識論的觀點，妥協而達成的同意固然只能「同意其不同意」（agree to disagree）而不致力於歧見的消除，但是這種包容相異的同意本身也提供了一個肯定：正因為相異並存的合法性，所以一旦達成協議，這個協議實際上代表「皆大歡喜」的共同利益，為有關各方面所樂意遵守及維護。這種隱含有「共同利益」及「包容相異」的特點，實為近代西方國家政治社會結構（包括大眾傳播媒介結構）能夠有效地執行功能的原因之一。用可以觀察到的現象為例，今日西歐社會一方面為強調群眾利益的社會主義思想及活動的盛行，一方面却難免對封建社會所後遺的王室貴族氣派的仰慕（例如女王加冕盛典等）；前者可以說象徵著群眾利益的傳達，後者則為對傳統君主貴族的統治勢力的尊重。



## 第二節 現代大眾傳播媒介的角色與功能

從系統功能的觀點，不論是傳統的、原始的、或近代民主或集權的類型的政治系統，都具有溝通的能力（communication capability）。這種溝通的能力對於系統模式的維持（pattern maintenance）、系統對環境的適應（adaptation）、系統目標的獲取（goal attainment）及系統功能的整合（integration）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因而吾人可以說：溝通能力的強弱實際上決定了政治系統類型的區別。〔註八〕不論是中國古代黃河流域或埃及尼羅河流域的原始社會，亦或是幾千年來散布世界各地的封建帝國，只要具有相當程度的溝通能力，吾人也可以假設都具備有某種形式的大眾傳播媒介結構。

所謂「大眾傳播媒介」（media of mass communication）泛指所有非人身的溝通方法（impersonal means of communication），透過這些方法，將可見（visual）或可聽（auditory）之訊息直接傳給觀眾或聽眾。按社會學家的研究，它是介於傳播者（speaker）和收受者（audience）之間的一種傳達「非人身的複製品」（impersonal reproduction）（指訊息）的結構。〔註九〕既然它強調「大眾」，那麼這些複製品必須是一般群眾在手段上可以輕易獲得，在金錢上有能力購買。〔註十〕由此觀之，部落民族的戰鼓、號角或旗幟所表達的訊息，古代中國的烽火台或貼在城牆上的榜文等，都可以算是一種大眾傳播媒介。反之，凡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personal communication）以及不是人人有能力獲取與購買的複製品如攝影雜誌、收音機修理等特別為「少數人」而傳播的媒介則不可以被視為大眾傳播媒介。在這個「大眾」的脈絡關係內，媒介的觀聽眾必須包括很多人，並且必須在最可能的短時間內將訊息傳遞給他們。觀聽眾的範圍是否廣大？時間的效率是否迅速？等等都可以用為衡量大眾傳播媒介結構功能的基本指標。就此

原始或傳統政治系統中的媒介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現代人已經對於既存的（以電視、電台、電影、書報雜誌為主體）感到不滿足，認為它們溝通的範圍

不夠全球性、速度仍然太慢、複製品本身的品質欠佳等。更進步的設計如電腦閱讀及越洋電視已經逐漸在推廣中，將來勢必又有革命性的突破，使既存的媒介顯得落伍。

前節所討論有關西方國家整合過程中群眾利益表達的合法化，乃是對於媒介形成的大環境的分析；本節則研究在這個大環境中媒介的政治角色與功能。

分析媒介在近代政治系統中的角色與功能，吾人發現傳統封建層級如何瓦解的過程極為重要。從博物館的陳列品可以看到中古歐洲的書籍為真皮紙及燙金字，此點顯示訊息的傳播對象主要是限於富裕的統治層級；隨著中產階級及平民努力的成果所產生政治份量（*political weight*）的增加，媒介也擴大為替中產階級、平民作利益傳達。

在莊園經濟時期，平民依地而耕，地又操縱在封建諸侯手中；平民除了大規模的反抗（此點極不可能）及經常性的異態示威以外，幾乎無法運用可行管道以傳達他們的利益。一旦重商主義盛行，經濟結構開始轉變，中產階級的中堅分子興起而掌握系統的生產活動，封建貴族的力量也相對地衰退。對平民群眾而言，貴族既然可望而不可及，中產階級的成就至少成為平民的寄望（*aspiration*）。中產階級固然未必真誠同情群眾的利益，但形勢使他們必須挾後者自重，為後者利益的代言人，俾便增加在與貴族中堅分子分配價值時的談判力量。從早期歐洲報紙內容的抽象理論傾向可以看出：有限的功能的媒介只能算是中堅分子式的反既得利益的表達，但是缺乏群眾的參與。

正因為中產階級的媒介不夠大眾化，無法動員群眾的支持，所以統治當局也較無顧忌地加以鎮壓，而媒介本身也沒有抗議的餘地。<sup>〔註十一〕</sup> 中堅分子式的媒介功能在被當局干涉下軟弱不振的同時，代表平民利益及鼓動平民意識的媒介應運而生，企圖獨立地作政治的輸入，一時頗有燎原之勢。它之所以能夠迅速扮演傳達功能的角色，與其說是理論家（如馬克斯者流）的號召，毋寧是實際社會狀況顯示平民遭遇的悲慘及意識形態的普遍覺醒。

從歷史記錄中可以得到的結論是：缺乏既得利益的群衆一旦集體爆發他們對現有秩序的憤怒，用具體的行動傳達他們的要求時，很容易與當局形成零數的對立關係，惡化爲不可挽回的革命形勢。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群衆的革命情緒受到雙重的鼓動：一是記憶猶新的法國大革命，一是既存的工業革命所引起的社會病理現象。面對革命的情勢，執政當局採取了可理解的措施：一方面維持秩序，一方面力圖改革，擴大群衆的政治參與。在讓步的過程中，獲得最大利益的既不是傳統的封建貴族，也不是群衆，而是中產階級。對執政當局而言，直接接受群衆的要求無異於拱手投降的革命；讓步給中產階級的好處是：中產階級珍惜既存秩序，一方面願意承認傳統的層級，一方面本身的新得利益使群衆感到有希望的鼓舞。吾人可以說：近代歐洲的基本穩定實開始於中產階級成爲「承上啓下」的平衡力量。經過這次的權力結構的再調整，大眾傳播媒介也成爲「承上啓下」的政治管道，逐漸演化爲符合現代觀點的形態。

十九世紀的群衆革命情緒與執政當局的改革措施最後演化爲以中產階級爲中心的妥協，而沒有產生革命性的巨變。導致這種相當圓滿的收場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正在群衆不滿情緒高張，激烈派理論家大聲疾呼的同時，中產階級爲了既得的穩定，不再挾下自重，而是與執政當局結合共同維持秩序，相當減低了群衆革命活動的效率（如媒介的宣傳的控制，拒絕對激烈運動的財力支持等。）第二、工業革命固然加速平民意識形態的覺醒及引發了反既存秩序的激進活動，與工業革命有關的帝國主義殖民侵略却緩和了系統的危機。海外侵略使西方工業國家幾乎無限制地獲得廉價的原料及勞力與可觀的利潤，這些利潤不惟增加整個系統的能力，也減輕了因爲財富分配不均所造成群衆與中堅分子對立的緊張關係。若其他情況均相同（*other things being equal*），以上兩個原因有助於解釋何以十九世紀西方國家能夠循自由主義民主原則，成功地整合了系統內部的價值分配糾紛，使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對這個時期的憂慮顯得多餘：「…人有一種追求平等的熱情，這種合乎人性及法則的熱情激發人們希望有權威及光榮

，這種熱情企圖提拔貧賤而使其置於富貴；但是人的心中也存在著一種邪惡的平等感，這種平等感驅使弱者企圖將強有力者貶低為弱者，寧願平等而一起被奴役，不願不平等而享有自由。」〔註十二〕。這是一種建立在剝削貧弱地區以維持本國富庶安定的基礎上的社會和諧，其傳播媒介的角色充滿著情感上的矛盾：它可能一面替勞工階級的福利及尊嚴呼籲，一面則大作大企業產品的廣告及間接暗示對階級社會中上層的華貴的讚美。一旦富庶安定的基礎發生動搖，和諧將喪失平衡，媒介也反應了這種紊亂，例如五〇年代末期法國人對阿爾及利亞戰爭及六〇年代美國人對越南作戰時期等。當時很多政府決策者抱怨媒介過度暴露了作戰過程，使國內人民情緒化而干擾決策行爲。就戰爭目的的觀點，這種抱怨是有道理的。但是就西方媒介的功能的觀點，這是群眾利益要求表達的自然反應：群眾要求瞭解作戰的理由及目的，如果執政當局的解釋含糊，群眾即懷疑該戰爭僅是為了維護中堅分子的利益而犧牲群眾，群眾遂提出抗議。〔註十三〕

許多非西方國家（如埃及、俄國、韓國及一些亞非拉丁美洲國家）則有不同的發展及經驗。近百年來，西方國家的政治社會結構變化餘波所及，這些非西方國家的傳統的權威也受到以知識分子為領導的群眾的挑戰。但是在這個群眾對傳統中堅分子的衝突的過程中，却缺乏西方社會中那種有力的中產階級的承上啓下的協調作用，使系統能夠在既存秩序為基礎上作演化式的改革。由於基本利益無法協調，平衡勢力（指中產階級）或不存在或太微弱，社會層級之間惡化為零數關係，成為兩種極端的狀況：一是群眾推翻傳統權威的革命性巨變，一是傳統權威寧可鎮壓群眾的政治要求以維持既存秩序。在這兩種狀況中，傳播媒介也分裂為二而對立，一個以秩序為號召，一個以革命為目標，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有趣的是，西方國家的媒介對於非西方國家之間或之內的衝突也採取了不同的看法。例如瑞典社會民主黨與英國保守黨所影響的媒介在對尼克森 1973 年攻擊高棉的決定看法即不相同；美國有關越戰的電影如「獵鹿人」(*The Deer Hunter*)與「還鄉」(*Coming Home*)對美國及越南社會及人民的關切的重點亦相差甚遠。

何以這些非西方社會在封建（或半封建）層級瓦解的過程中，無法產生有力的中產階級來扭轉群眾的革命情緒或加速傳統權威的改革？吾人固因每一個系統的文化背景不同而難以作通則性的解釋，至少發現了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是，在西方社會逐步走向政治多元化（先是政教之爭，後來依次為君主與貴族、中產階級與傳統權威、群眾與中產階級與傳統中堅分子等）的同時，非西方社會却在絕對的政治權威的指導下面臨西方的影響，採取反抗（至少是敵意）的態度。〔註十四〕 在西方，宗教戰爭帶來了重商主義，工業革命帶來了群眾（勞工）的覺醒，兩者都是自發性的社會發展，而非統治者由上對下的號令；換言之，群眾的政治地位是自己所建立，中堅分子僅面臨前者所建立的事實。反之，在許多非西方社會，群眾被認為是傳統權威的臣民或子民，群眾的政治權利（如果有）是由統治者恩賜，統治者與被治者為牧羊者與羊群的關係而已。在歐洲，宗教戰爭相當破壞了政治權威，使工商業能夠在相對的自由放任環境中發展而成為既成事實。反之，在許多非西方社會，政治權威可能因為政變（*coup detat*）而轉移，但層級節制關係仍舊不變。群眾不但少有機會表達他們的集體要求，既使有可能增加他們政治力量的舉動如文官考試或經商致富等也受到嚴格的管制。群眾依靠土地或勞役僅可能但求溫飽，經商則可能「富可敵國」，成為政治威脅。所以在單一（*monolithic*）權威控制下的傳統社會，對於商人總是採取敵視的態度，例如中國的重農抑商政策。在這種環境中，商業活動僅為群眾的謀生行為，中產階級的形成實質上不太可能。〔註十五〕

對西方國家而言，工業革命所造成的社會結構變化是自然演化式；對非西方而言，十九世紀末期的工業化政策則為一種政府的政治設計，企圖達到預計的成果。由於工業化是由上對下頒布實施，民間缺乏既存的中產階級結構，這種狀況嚴重的妨礙了層級衝突的協調。因為工業化既然由國家發起、投資及經營，一切政治社會後遺症也必須由政府承擔。工業化成功，當然會加強政府的權威；失敗呢？也會加強政府的權威，以便解決經營不善、分配不均、群眾不滿等問題。不論成敗與否，介於群眾與統治中堅分子之間的中產階級皆難以生根發展。由於缺乏承上啓下的潤

滑功能，系統內部層級之間的衝突趨向群眾與傳統權威的兩極化的對立，極易導致後者對前者的壓制，或者惡化為群眾推翻現狀的革命（如俄國革命）。在這種衝突狀況中，大眾傳播媒介不是協調並包容各層級利益衝突的管道，而是受某特定層級支配的動員工具。例如共產黨在從事叛亂活動時，它的媒介成為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利器，與執政當局勢不兩立；反之，一旦革命成功，共黨黨徒成為統治中堅分子，媒介乃完全由執政當局控制，名義上仍然號稱為群眾服務，實際上群眾本身毫無使用媒介來傳達要求的權利。〔註十六〕由於媒介成為執行系統溝通功能的官僚機構，所以難免也隱含了統治中堅分子內部的不同利益之爭，但是這種衝突僅止於統治階層，在群眾之前則維持著表面的團結與和諧。〔註十七〕

總而言之，不論在西方或非西方國家，媒介本身必須反映「大眾」的利益或大眾的參與，十足證明了孫中山先生的觀察：「世界一天進步一天，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註十八〕所不同的是：西方的媒介包含了貴族（或資本家）、中產階級、群眾利益的妥協；許多非西方國家的媒介則由統治中堅分子完全控制，由他們來決定群眾的利益或者群眾參與的程度。

### 第三節 現代大眾傳播媒介的普及性及影響力

以上兩節說明媒介結構在系統中代表「大眾」地位的合法性及傳達「大眾」利益的角色，本節則分析該角色執行功能的程度，亦即媒介的普及性及影響力如何的問題。

「需要為發明之母」，現代媒介之所以具有無所不在的普及性及因此而來的影響力，固有其必要性及必然性。決策者的操縱及媒介本身的「自我推動力」（self-propelling）功能雖然會增援這種必要性及必然性，決定媒介功能的程度者則是政治社會的發展及隨著該發展而導致的人性的反應及需求。

首先要澄清的是：所謂現代媒介的「現代」的時間幅度為何？如果從結構方面來探討，現代媒介必須追溯到近代民族國家的起源及整合的過程。如欲論及普及性

及影響力，吾人認為兩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國際政治系統內結構的再整合才是最重要的轉捩點。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前，即使是群眾政治地位制度化的西方歐美各國，媒介仍未充分把群眾的意識形態具體化；即是說，媒介的複製品仍然相當中堅分子傾向。例如當時主要媒介的報紙雜誌所用的文字及報導內容極不平民化，且常常成為中堅分子之間利益衝突的戰場，非一般大眾所能夠（或者願意）吸收瞭解。二十世紀初期報紙如倫敦泰晤士報、紐約前鋒論壇報、宇宙雜誌，在今日讀之，一般大眾都不習慣。我國在清末或民初的報紙如康有為的大公報、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國風報及北洋軍閥的通電等，其文詞艱深，也只能供知識分子閱讀而已。這種中堅分子式的媒介即使內容是啟發民智及謀求大眾福利，但專業化的程度太高，和群眾脫節。由於群眾沒有興趣參與，它在社會上的普及性及對群眾的影響力也非常有限。

很難精確估計現代媒介的複製品何時廣泛地被大眾參與；無可否認，十九世紀中葉西歐激進的社會主義者的革命運動相當影響了這個大眾化的過程。為了動員群眾的身體及精神的力量，激進的革命家的宣傳內容必須有效地深入人心，令群眾瞭解本身的處境及任務。殆一次大戰爆發，開始了歷史上第一次捲入全體人民的總體戰（general war），媒介結構更須擔負動員的責任。它的密集使用有助於提高了群眾對系統的參與意識，促使他們覺得本身為系統不可缺乏的角色，加強他們的國家屬同。在同時，為了作戰的需要，歐洲參戰國徵調了大批亞非殖民地的勞工支援戰場。這些亞非地區勞工群眾受到了大局勢的影響，產生了幾乎前所未有的自我的意識的重估。戰爭結束後，他們帶回了歐洲人所自諛的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及平民參政的原則；這些觀念及原則和俄國革命的餘波互相作用，相當影響了亞非地區的反殖民地運動。事實顯示，一次大戰以後，亞非的殖民地或次殖民地開始大量出現傳播媒介；這些媒介不再僅局限於中堅分子傾向，而是直接訴諸群眾，以動員群眾、鼓動風潮為目的。

如果第一次大戰的經驗算是全面喚起了並肯定了群眾的自我意識；那麼第二次大戰算是實踐了這種自我意識，革命性地調整了在群眾對中堅分子脈絡關係內的國

際社會層級。建立在不平等的階級優越或種族歧視的心理基礎之上的結構急趨喪失功能，取而代之的是風起雲湧的群眾的要求：如政治參與、社會福利、價值分配等方面的平等與正義。如果觀察戰後國際或國家政治系統內部的衝突模式，吾人幾乎可以建立一個「群眾對中堅分子」或者「有對無」（have vs. have-not）的分析架構。幾乎任何政治社會現象，從羅德西亞及南非內部的種族糾紛、巴勒斯坦自治問題、中南半島戰爭、聯合國大會的表決、美國境內的非法移民等等，無不是具有一個基礎性的特點：即是，群眾具有清楚的自我意識的參與。當前的形勢指出：維也納會議瓜分歐洲或雅爾達會議瓜分亞洲的「巨頭」時代已經結束；現代的巨頭如季辛吉沙達特比金等，如果沒有群眾的參與，也無法解決中東的和平問題。這是一個大眾社會的時代（the era of mass society），大眾傳播媒介也發揮了它本身應有的功能：普及性及影響力。誠如蘭斯莫洛（Lance Morrow）以媒介功能的觀點評論 1977 年埃及以色列有史以來的首次高峯會議：

電視的出現無疑地改變了沙達特訪問的意義。這位埃及總統曾說：「中東問題的百分之七十是心理問題」——我們可以說，電視在建立埃及及以色列的新的心理方面，具有驚人的效果。電視可以說肯定地在影響沙達特及比金的行為，因為「觀察某事就會巧妙地改變了某事」。沙達特和比金都是老手，他們知道：「全世界都在看我們！」他們清楚地瞭解他們所創造的效果：他們故意地在利用媒介。以色列的梅爾夫人後來說：「我不敢說他們最後是否會得諾貝爾和平獎，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他們應得到奧斯卡最佳演員獎。」這個事件的性質及媒介的參與確曾擴大了他們的行為與姿態的效果。〔註十九〕

所謂群眾具有清楚的自我意識的參與與不具有的差別是：前者認為不僅日常生活有關的訊息，凡是系統內部的一切訊息都可能和他們產生利害關係；他們不但渴望知道這些訊息，甚至希望知道這些訊息的結果及影響。反之，後者也許處在「帝力何有於我哉」的拒絕參與，或是接受所屬社會層級的指揮而自己不作決定的生活狀態。由於複雜性的決定由所屬社團代勞，個人反而能夠自給自足、獨立、個人主



義式。茲以選舉爲例，學者發現在數十年前的歐美社會，對團體、政黨的忠誠乃是選民作決定的最重要因素，所以他們通常早在競選活動之前即已決定支持某候選人。〔註二十〕 在現代的大衆社會中，情況就不同了。新的變數——如都市化、工業化、科技發展、知識爆炸等——使舊的社會層級逐漸解體；新的生活模式——如職業轉變、戶口遷移、犯罪率升高、空氣污染等——使人際溝通減低至最低限度；社團對個人的保護也越來越疏忽；個人在這種環境中面臨極大的壓力，感覺到自己的無知、無能、恐懼。在大衆社會中，意識形態的覺醒更使他們覺得缺乏安全感，反抗傳統層級的不平等的結果是使他喪失了「社區感」(sense of community)。如萊特密爾氏所言，個人在大衆社會的生活是：

他喪失了獨立性；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想要獨立的願望。大衆社會的生活滋長了不安全感，加深了個人的無能。〔註二一〕

儘管個人的學識及能力有限，但是他被迫必須在日常生活中作許多決定。在決定的過程中，他們面臨許多困難，諸如對所要決定的事或人的資料可能一無所知，這個決定不是他們願意作的決定，決定的後果他們毫不關心等等。因此，他們必須尋求一個有效的管道來建立個人的認同，媒介遂成爲滿足這種需要的重要機構。

大衆社會的媒介的來源不論是革命式或演化式，它的普遍性及影響力可謂應時勢而生，非決策者所能任意控制。意識的覺醒導致對參與、平等、正義的要求，環境對生活的壓力導致對知識及行動的要求，這些種種不同的要求使孤立的個人不約而同的產生一種共識(consensus)。所謂共識並非思想或利益目標的共識，而是要求屬同於某種強有力的系統的共識。媒介本身不是也未必能夠創造這個大系統，但是它却能夠充當有效的管道，使個人「覺察」(perceive)以爲已經屬於某種能夠滿足他對參與、平等、正義、知識、行動要求的系統。例如透過媒介，抽煙者知道既使煙可能妨害健康，世界上仍有數億個癮君子，便會有吾道不孤的欣慰。女士們渴望追蹤時裝的流行動向，以免她們成爲孤立的落伍的土包子。開發中國家的人民急欲知道他們的國家形象，恨不得早日被認爲先進國。……以上乃個人對於大衆

社會中「社區感」的追求，當然可能透過各種途徑獲得，不過媒介乃為最有效率者之一。

其次要分析的是媒介本身的「自我推動力」。政治社會的發展及人性的反應及需求造成媒介的必要及必然性；從另一方面說，媒介一旦具有普及性及影響力，它何嘗不操縱了政治社會的發展，加深群眾對它的依賴，創造群眾新的需要，使它更具普遍性及影響力。最具體的例子之一就是它的廣告功能。廣告是一種發明與需要的互動過程。最初是商品製造者先調查群眾的需要，然後再決定商品的質與量，利用媒介介紹宣傳，讓群眾知道、喜歡而作購買決定。但是一旦廣告功能良好，造成群眾連續性的購買行為，也導致同樣商品製造者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很合邏輯地產生兩種現象：一是講求廣告技術，使同類商品具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以增加群眾的喜好。一是改革或創新商品，以不同的選擇來吸引購買者。這兩種現象不但擴大而且曲解群眾的覺察與認知，使他們易於被操縱而不自知。抑有進者，現代的廣告本身已經成爲一種科學性的專業，它不但是手段，而且是目的。它動員許多學者專家及才智之士在研究、策劃、執行，其優越性永遠勝過群眾的判斷力。它不但推銷商品，而且推銷思想、意見、人格、職位等等，其效能之高，頗有「視百姓如芻狗」的味道。弗羅姆（Erich Fromm）對這種現象的感歎是：「現代社會已經發展出一種市場人格（marketing personality），主要的重點是把個人視爲商品及把個人的價值視爲交換價值的經驗。」〔註二二〕至少，弗羅姆的話反映了媒介的普及性及影響力，實非過實之言。

總之，大眾社會產生所謂大眾文化，一切活動逐漸形成一種「集合」（conglomerate）形態：從可見的生產線、商品化、市場化、大貿易商、跨國公司、軍事與工業的勾結（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到不可見的群眾意見（public opinion）、洗腦、廣告心理等。而大眾傳播媒介正是這種集合形態的大眾文化的象徵，它的普及性及影響力和科技及人爲的運用互相增援，在群眾之中塑造麥克魯翰（Marshall McLuhan）所謂的「集體的部落形象。」〔collective tribal image〕

：「我們所知道的民主政治已經結束了……個人自由本身在新的部落社會中固然沒有被壓制，但是有了不同的及更複雜的範圍。傳統上，選舉是透過政黨、政治問題、政治目標來作判斷，那個時代已經不再。現在進入的時代是：集體的部落形象及部落酋長的圖中形象（icon image）就是政治現實。」〔註二三〕在不知不覺中，群眾的意識形態、行為方式、未來的方向等等，表面好像能夠脫離社團或所屬社會層級的規範而趨向作獨立的判斷；其實，他們因為企圖作獨立判斷而利用媒介獲得訊息，反而被媒介規範，成為不約而同的模式。〔註二四〕

### 第三章 大眾傳播媒介與決策系統的互相依賴 與衝突

#### 第一節 大眾傳播媒介與決策系統的互相依賴：阿蒙模 型的適用及評估

阿蒙曾指出，「分析並比較政治溝通的表現，乃是探討不同政治系統的有趣的、有用的方法之一。」〔註二五〕在政治系統中，決策系統的運作必須依靠訊息來做為決定的基礎，也必須將所作決定以訊息傳遞出去，……凡是涉及決定、執行、效果反饋等支持與要求的互動關係，都有賴於訊息的溝通。

現代決策系統運作的特徵之一是溝通功能，亦即「利益傳達」（interest articulation）的高度發揮，因而使媒介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所謂利益傳達即是在現代政治系統中，個人或團體對決策系統提出要求與支持（包括為了獲得要求的實現而作之支持）的訊息傳遞的過程。〔註二六〕在一個政治系統中，每一個結構都有提出要求的功能，且發揮的功能各有效率上及結果上的不同，這種不同影響了它們受惠於政策的程度。按阿蒙的模型，利益傳達可以在結構上與功能上分為幾個類型：一是發起「傳達」的利益團體的類型，計分個人、異態團體（anomic interest groups）非結社團體（non-associational interest groups）、機構性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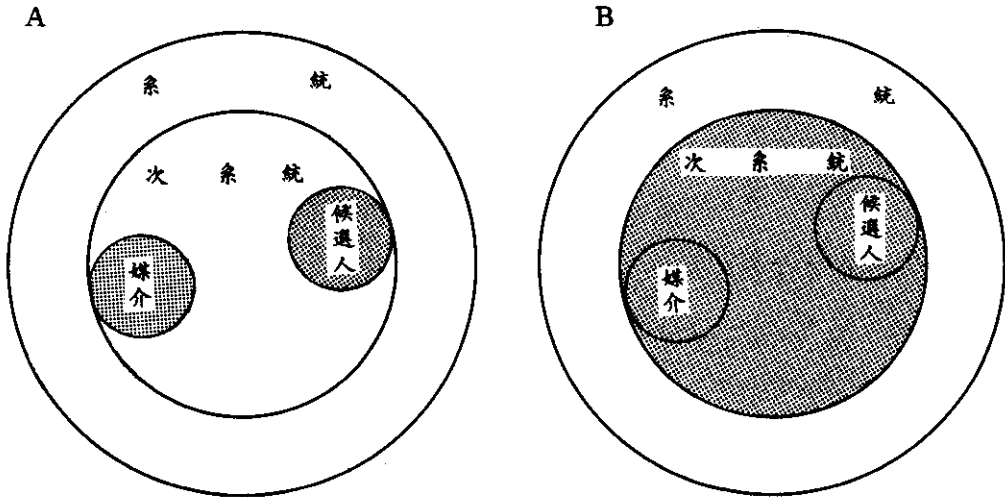
體 ( institutional interest groups )、結社性團體 ( associational interest groups )；一是執行傳達的行為模式，阿蒙稱為「接近管道」的類型 ( types of access channels )，計分示威及暴力 ( physical demonstration and violence )、個人聯繫 ( personal connection )、中堅分子代表 ( elite representation )、正式及機構性接近管道如政黨及媒介的運用等。〔註二七〕

阿蒙模型很完整地分析決策系統中利益傳達的結構與功能，但是沒有特別強調大眾傳播媒介與每一個結構的互動關係。事實上，如果缺乏媒介的觸媒作用 ( catalyst )，單獨的結構對決策系統的支持與要求的效能將受到消極的影響。社會科學上所指的觸媒係指一個人或一件事充當刺激物，使能帶來某種結果或加速了某種結果。在阿蒙的模型中，吾人固然不能否認其利益傳達的效果，但是可以合理的假設：若其他狀況均相同，利益團體結構在對決策系統執行要求及支持的過程中，如果有了媒介的觸媒作用，則雖然未必因而「帶來」所期望的結果，至少會「加速」帶來所期望的結果。另一方面，媒介的觸媒作用也使自己獲得了極大的利益，它不但因為「消息靈通」、「主持正義」而使銷路及廣告量大增，同時也可以在利益傳達的過程中分享決策的成果。事實上，媒介本身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一個享有既得利益的利益團體。茲以「異態的利益團體」為例。它利用示威或暴力來傳達對決策系統的要求，但如果沒有媒介的介入，也許這種暴力行為的影響力僅僅限於尋常性的犯罪事件。反之，透過媒介的傳遞，與其他系統內的結構發生互動關係，將會具有「一葉落而知秋」的潛在力。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 的劫機、殺人等暴力行為，即因透過媒介的觸媒作用，使國際之間知道它的歷史背景、活動概況，及其與以色列或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淵源等。其結果是不但有相關的決策系統 ( 以色列美國或聯大安理會等 ) 受到了巴解的輸入；同樣重要的是全世界因而知道巴解這個政治實體，對巴勒斯坦難民的人道主義的同情，工業國家對於中東地區穩定的憂慮等，都成為對決策系統的輸入。這一來，巴解突然成為國際問題，有關的決策系統受到國際利益團體的要求與支持，導致許多決定如巴解得

派觀察員常駐聯大，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在國際上享受元首待遇，以色列容忍巴解出席中東和平會議等。如果沒有媒介的參與，這些結果恐怕不是單獨的巴解的暴力行爲所能達成。吾人同樣地可以假設：巴解在行使異態的利益傳達時，媒介的觸媒功能早已列入考慮。他方面，媒介本身也面臨極大的挑戰：諸如消息是否正確而迅速，報導是否無意中得罪某有關利益團體或按意料取悅了某有關利益團體，等等無不關係到媒介的生存與繁榮。

很多人慨歎現代的政治競選費用越來越昂貴。根據非正式的估計，台灣地區一位省議員約需台幣六百萬元，縣市長一千萬元，立監委一千萬元；美國、日本的大選更是動輒億美元以上。從媒介與決策過程互動的脈絡關係觀之，競選費用的昂貴除了顯示競爭激烈的程度，更重要的是系統中結構（包括媒介）互動功能的加強，使更多的結構因為牽涉到選舉的成敗而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傳統上，競選經費可能主要來自候選人本人，或政治投資者如他的家族、親信圈子、或者他所屬的社團（包括政黨或黨派），這些政治投資者和系統內其他結構的互動頻率極低。候選人之所以當選，主要是靠他本人及政治投資者的努力，所以他主要的政治債務是報答政治投資者，對系統內其他結構則沒有必須履行的義務。〔註二八〕這一類的競選本身也是一種利益傳達，但是主要屬於「個體」的結構的發揮。由於是孤軍奮鬥，所能動用的財力總是有限，是以常常發生候選人在競選後破產、負債或貪污舞弊等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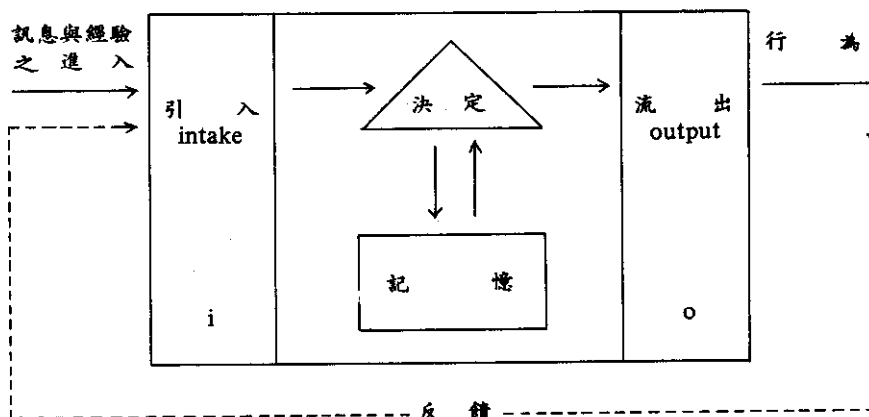
另一種情形是：候選人本身或者他的親近圈子未必富裕，但是他屬於某一個利益團體，該團體與系統內的許多結構（或稱次系統亦可，包括媒介）發生密切的互動關係。他不但有其「自我認同」（self-identity），更重要的是，他是「集體認同」（collective-identity）的一部分。他的成敗不但事關他個人、親信圈子及所屬的團體，且事關與這個團體利害攸關的其他團體。由於他的競選牽涉到多方面的利益，所以他的財力支持也自多方面，其力量當然非孤軍奮鬥者所能匹敵。如以黑影部分代表候選人所代表的利益及所能動用的力量，則A B兩型的區別至為明顯：



比較A B兩類型的競選，吾人發現政治上「應該如何」(what it should be)與「事實如何」(what it is)之間的兩難。A型競選方式的優點是：執行利益傳達時，由於較不受結構互動的影響，將擁有更多的獨立性。如果他具有奉獻精神，他可以拒絕許多利益團體的遊說，不徇不倚地替全體人民的利益向決策系統執行輸入。問題在於：有鑒於現代系統結構互為依賴的運作方式，以及現代競選所需的費用，吾人發現A型競選方式極不容易成功。何況如果競選費用來自親信的支持，當選後要拒絕這個圈子的壓力也不容易。反之，B類型的候選人的支持來自許多結構，所以當選後義務很多，不但要對本人及親信圈子負責，且要對這些相關的結構負責。他的當選不但使自己受惠，也惠及黑影部分的結構，所以他將繼續擁有廣大的支持，使他在下次選舉中容易當選。<sup>〔註二九〕</sup>不過最明顯的後遺症是，與競選者發生直接或間接關係的利益團體到底只佔整個系統的一部分（如黑影部分顯示），他所能傳達的可能僅是特殊利益，未必惠及全系統。如果他善於運用這些結構，有效率地傳達並保障這些特殊利益，他的當選穩操勝算，於是形成相當程度的專權 (monopoly of power)。例如工業區支持出來的民意代表通常對空氣污染法案表示反對，軍火製造業支持的代表對於限制軍備不熱心等。

B類型的競選方式也並非沒有優點。除了反應現代系統內結構互相依賴（包括媒介）的特徵，以及擁有雄厚財力的支持以增加成功機會之外，它可以促進利益分配的公開及公平。由於使多元化的利益牽涉到在傳達的過程，形成見者有分的形勢；見者越多，公開及公平的要求也越迫切，使利益壟斷或翻雲覆雨更加困難。1972年美國的水門事件就是一個例子。在要求公開公平的選舉過程中，每個人或每個團體多多少少都互相虧欠，互相支持；支持共和黨成功者何嘗不虧欠支持民主黨失敗者（至少是後者的尊重遊戲規則）？假定水門事件得以順利成功，民主黨沒有機會執政，則支持民主黨者如何均沾利益呢？

從媒介的觀點，決策系統乃是一個訊息溝通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利益經過傳達、集結（*aggregate*）而作成選擇（*preferences*），再就這些選擇中作成決定，將決定付諸實行。按道奇（*Karl W. Deutsch*）的分析，吾人可以把現代國家政治系統中訊息的溝通以及決策行為的關係分為五個層次，每個層次由一個「意見儲存庫」（*opinion reservoir*）構成。這個意見儲存庫包括中堅分子與群眾的意見，這些意見可能屬於個人、社會機構、或地位團體（*status groups*）。每個層次的溝通及行動可以用下圖表示：〔註三十〕



第一個層次的意見儲存庫是屬於所謂「社會經濟中堅分子」(socio-economic elite)。以西方國家而言，約佔全國人口的2~3%，在非西方國家則難以估計。評估社會經濟中堅分子(簡稱SEE)的標準是較高的財產、收入、社會地位的人或機構，諸如老板、股東、經理人員、專家學者等以及與他們有關的機構如家族、社團或公司等皆屬之。這些由人或機構所形成的SEE並不見得各自形成一個團體，而是一個錯綜複雜的重疊的溝通網。例如一個人可能擁有許多職位以及一個機構也控制許多其他機構，SEE可能也是兼任另一個層次的重要幹部等。由於地位相當，每個人都是有恒產斯有恒心的才俊之士，他們常常共同享有(或支持)許多「回憶」(或指歷史)，共同喜好某種選擇(preference)及作風(style)，甚至言行都有相同的模式。所以在這個SEE層次內，他們可以說溝通頻繁，例如一窩蜂讓子女讀美國學校或復興小學，或移民南美哥斯大利加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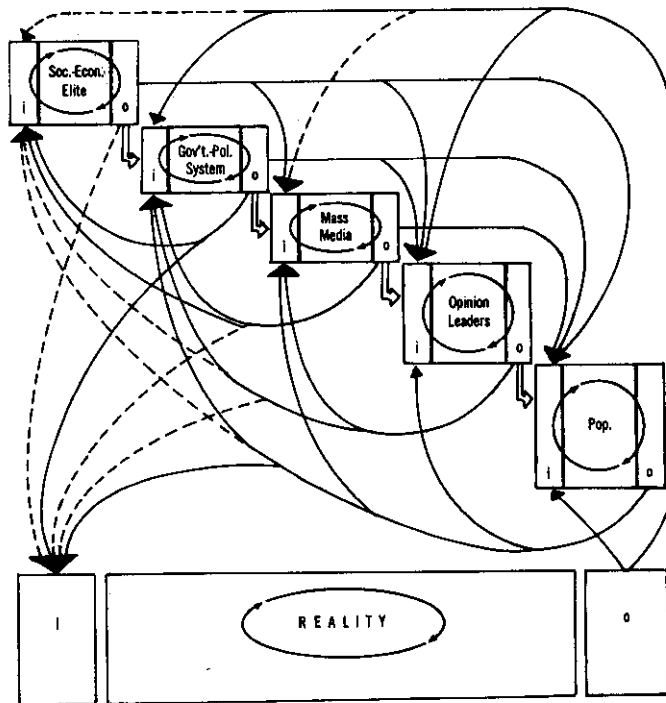
第二個層次的意見儲存庫是「政治及政府中堅分子」(political and governmental elite)，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在職官員及對他們有影響力的分子，包括民選或派任之高級官員、法官、民意代表、政府顧問人員、有潛在力的在野要人及退職或退休的上述人員等。當然，這些人的意見或心態因他們的重要性及影響力不同而不同(如中央或地方、主管非主管、執政黨在野黨等差別)，但至少存在有某種團結性(Cohesion)及溝通頻率，因而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意見儲存庫。第三個層次為大眾傳播媒介。他們由於執行「承上啓下」的功能，既要顧及國家安全，又要爭取自由，有時固然能面面俱到，也常常被兩面夾攻。面對這種複雜的狀況，使媒介的工作人員有了他們的想法與意見。第四個層次的溝通系統沒有以上三個具有團結性，但是其重要性也不可忽視。它是由全國人口中的5~10%的人構成的「地方意見領袖網」(the network of local opinion leaders)。這些人經常性地注意媒介的內容，不但對本國的政治過程有興趣，對國際政治也密切注意。他們雖然也和一般群眾一樣地在接受訊息，但是他們的解釋及態度却決定了群眾對同樣訊息的解釋及態度。例如媒介如果在推廣節育運動，意見領袖的贊成將使媒介的效果加大



；如果反對，群眾不但可能反對，甚至可能反抗，1978年印度甘地夫人的下台就是這種狀況。這些意見領袖的影響力在傳統政治系統中更爲有力，甚至到干預決策過程的程度。何以共黨政權不但要打擊它所謂的「惡霸」，也要清算「善霸」？這種它所謂的「善霸」在溝通訊息的脈絡關係內而言，可以算是極具有權威的地方意見領袖。第五個層次爲人民群眾，由於他們知識水準的提高，自我意識的普遍覺醒，使他們的想法及喜好成爲決策過程中必須被列爲重要的考慮因素，其詳細情形已在前節分析了。

以上五個層次的意見儲存庫的互動，執行阿蒙模型所指的利益傳達的功能，形成現代的決策系統。道奇把這五個層次用一個階層式瀑布的圖面表示出來（如圖），從圖中吾人可以大率瞭解媒介與決策系統中互相依賴的溝通作用了。（註三一）

媒介在決策系統中的運作模型



總而言之，吾人毋庸反證明（*falsification*）即可肯定：大眾傳播媒介的觸媒功能使決策系統的運作功能更高，利益的傳達更暢通，價值的分配更公開公平，終而使整個政治系統更健全有力，媒介本身也於焉受惠。在這樣的系統中，媒介維持了多元的利益的妥協與平衡，其重要性，至少在西方國家已如此承認，實在不亞於行政、立法、司法機構，故學者每將媒介列為第四機構（*the Fourth Branch*）。

## 第二節 大眾傳播媒介與決策系統功能上衝突之必然性

衝突乃系統運作過程中無法避免的一種不平衡（*disequilibrium*），其發生之原因、結果、模式及持續度因有關之角色及環境而不同，有時是狀況性（*situational*），有時是人為性（*personal*），有時則為功能性（*functional*）。前兩者性質的衝突常因為狀況及當事人之變化而喪失持續度；後者則因為涉及系統之運作，除非系統內部結構的再整合，否則衝突有其必然性及持續度。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之。一是史記記載韓信的顧問蒯通鼓動韓信造反失敗被漢高祖逮捕，高祖欲殺通，通認為是冤枉，應免極刑。理由是：「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註三二〕 另外是美國 Kansas 大學教授馬倫霍夫（*Clark R. Mollenhoff*）（曾得普立茲新聞獎）素來以在新聞界抨擊艾森豪、甘迺迪、詹森等總統的政策聞名。1969年，尼克森為了防範未然，聘馬倫霍夫為白宮顧問，馬氏遂反過來替尼克森辯論而評擊新聞界。也許評擊得太過火了，甚至使尼克森也覺得太得罪媒介。馬氏遂在次年辭職，再回到新聞界評擊白宮政策。以上兩例即為功能上的衝突，前者為了爭奪領導權，後者為了保障結構的本位利益，兩者都是不可避免的。

民主政治的具體的定義是：一個國家的公民有權利參與政治決策的過程。〔註三三〕 吾人承認這種定義多多少少是一種信仰、理論或神話（*myth*）。因為事實上，每一個公民不可能有這種時間、精力、意願來參與決策的過程。因此，代議制

出現了，選舉實施了，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的法律制訂了……種種安排使公民可以不必參與決策而可以享受決策的成果，以及免於受決策者欺騙壓迫的危險；即使一旦有決策的成果無法獲得，或有被欺騙壓迫的危險時，公民也有方法糾正（即懲戒、彈劾、罷免等安排）。前章已指出，近代媒介之所以制度化，乃是經過百年來的演化，群眾地位在政治過程中獲得合法性的結果。所以大眾傳播媒介在民主政治系統中的功能之一就是確保決策系統既不敢越軌侵害人民的權利，也無法在越軌後不被糾正。由此可知它的功能不但是預防性的（preventive）——消息靈通使決策系統戒慎恐懼而不敢越軌，一方面也是糾正性的（corrective）——指出並追究決策者的不當或錯誤，使決策者必須負責。不管決策系統有無越軌或犯錯，媒介的功能使它「必須」假設前者已經有腐化的行為，根據該假設來設法證明之。這種功能上的使命使媒介陷入了與決策系統必然的衝突狀態，雖然這種衝突是合法的。

不論媒介與決策系統的功能的衝突是否有其正當性，吾人以爲至少是可以瞭解的。因為決策系統到底是「人」在控制，只要是人，何能免於人性中的貪婪、偷懶、邪惡等等負的本質？無可否認，在媒介及議會的監督下，決策系統無不是盡力補充才智之士，以增加功能。但是才智之士的界定有事實上的困難，因為吾人常常不易劃分人的性格與人的角色。許多善於批評及立論的在野之士，常被信服爲具有潛在力的傑出的決策者。一旦決策系統補充他們，其表現却又令人失望。如美國的季辛吉、布里辛斯基、當年的尼克森及現在的卡特總統等。問題不在他們的人品與性格不一致，而在於他們在不同的結構（角色）中無法執行同樣優良的功能。當他們在野時，他們的功能是「必須」以群眾利益的代言人爲己任；也由於這個功能執行良好，所以易於被推舉爲決策領導者。一旦成爲決策者，他們的功能變成爲「必須」解決很多複雜的問題，同時也必須面對在野之士的抨擊（一如當他們在野之時的角  
色）。由於批評總是比解決容易，許多從在野之士成爲決策者的表現顯得懦弱、猶豫不決、缺乏能力，令推舉他們的人大失所望。〔註三四〕

決策者因爲是人，即使是處於公平公開的民主系統，法律規定如何嚴格，結構

如何制度化，民意機關如何監督，許多潛在的腐化仍然是難免的。舉其大要者如權力的濫用的問題，其過程中當事人舞弊的技術、不當所得利益、濫權對系統的影響等，通常不易被偵查出來。尤其如果涉及高度專業性及技術性決策問題的腐化，簡直令局外人無法一窺其奧妙。例如當年伊朗當局採購新式戰鬥機，同時競爭的有美國的 F-16，法國的幻象三式，英國的獵犬式及以色列的雄獅等，何以最後決定美國的 F-16？當然伊朗當局必須考慮全盤的外交政策及純技術性的問題，但其中有無「內幕」的嫌疑是無法排除的。美國軍方每次在採購飛機、飛彈、坦克等精密武器，競爭廠商總有數十家，其中有無「暗盤」也是一直引起爭論的問題。1978年，紐約時報至少曾揭發某些五角大廈的將軍們接受格魯曼（Gruman 即製造 F-16 廠商）公司的招待，週末在長島打野鴨、住別墅渡假等情事，引起許多值得「想像」的猜測。至於已經被揭發者如前幾年的洛克希德公司弊案，除了在日本引起政治權力結構的再調整，美國國會同意把牽涉土耳其、義大利、伊朗、泰國、巴西、阿根廷等國的調查「視可而止」，以免使今後的美國軍火銷售受阻（目前是世界第一位，佔40%）。吾人且不必談內幕的證據問題，只要看美國的「軍事與工業的勾結」這句話（為艾森豪總統發明）就夠令人深省。〔註三五〕

媒介與決策系統「必然性」的衝突更因為另外一個因素而加重：即是決策系統的監督結構（如立法、司法機構等）的表現無法有效地防止前者的越軌，人民期望媒介能夠執行監督的功能，遂使決策系統與媒介處於對立之勢。從功能的觀點，決策者與決策監督者不可避免的衝突之勢類似一種貓與老鼠的遊戲關係：即是，老鼠如果被貓發現後再逃，其危險性太大；最安全的方法莫如不讓貓知道老鼠的藏身之處，甚至使貓根本不知道有老鼠的存在！換言之，現代決策者與其讓監督者懷疑有「疵漏」後被調查或設法辯護，不如事先預防「疵漏」的發生，使監督者不注意。所以現代決策者預防監督者實在煞費苦心，一方面聘請了大批的有關實務的律師、顧問、參事、助理等來預防及應付外來的責難或調查；另一方面則加強公共關係，建立自己美好的形象，例如美國聯邦政府即雇用 6,858人及每年花費四億兩千五百

萬美元在從事所謂「新聞工作」。<sup>〔註三六〕</sup> 反過來說，監督者也不甘示弱，其應變也隨著決策者複雜的業務及巧妙的防範而增進。他們不但自己監督，也起用了大批的專家學者充當幕僚，如美國麻州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Edward M. Kennedy）手下即有政府付薪的幕僚一百餘人。決策者和監督者在勢均力敵的狀況下遂產生一種妥協：他們乾脆交易好處，化衝突為合作。現代民主國家許多法案即是常常在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交換利益的狀況下產生，決策者有很多不當或錯誤也因而被監督者「忽略」了。<sup>〔註三七〕</sup> 在某些極端的狀況下，決策者除了和監督者互換利益，甚至運用不光明的手段來迫使監督者就範，如美國詹森總統即慣用一個手法：把搗蛋的議員請到白宮來，一面與他聊天，一面把聯邦調查局送來有關他的私生活檔案（這些資料可能記載他的金錢往來、男女關係、甚至違法記錄……）很「隨便」地放在辦公桌上。議員一面和總統聊天，一面「斜眼」看自己的檔案。當總統送客時，議員都採取合作的態度。<sup>〔註三八〕</sup> 由此觀之，現代決策系統與監督結構的功能上的衝突極可能由高轉低，人民對權力制衡的信賴也大不如從前。人民對政府可信度的懷疑使他們渴求獨立地瞭解真象，以便能夠伸張公正；媒介遂在這種狀況下相當取代了監督者的功能，與決策者發生衝突關係。事實顯示：近代許多國家的政府弊案，從日本的洛克希德案到水門事件到南韓朴東昇行賄案，幾乎都是媒介的手筆，而非出於監督者的努力。

站在民主政治的觀點，媒介與決策系統持續性的功能衝突似乎是健康的，對大多數人民有利的。但是有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是：媒介固然可以彌補三權分立功能之不足而防止或糾正決策系統的腐化，媒介本身如果濫權，誰來監督媒介？由於媒介的功能的支持者主要來自群眾，群眾本身又是不犯錯的政治主宰，前者很容易被系統縱容為寵兒；決策系統如果干涉媒介的運作（不論正當或失當），媒介最佳的防禦是指控前者侵犯「群眾權利的維護者」。然而，現代的媒介真的是群眾權利的忠實的維護者嗎？很明顯的事實是：它本身不但是一個利益團體，且已經成為勢力雄厚的既得利益者。例如在 1967 年，全美國電視台的廣告有 78% 來自十個大公司

，〔註三九〕媒介願意替群眾來得罪這些大公司嗎？實屬疑問。更令人感到諷刺的是，媒介爲了增加群眾對它的支持，很多手段也難免流於腐化。如果決策系統無懈可擊，成爲「無新聞就是好新聞」（no news is good news），那麼媒介本身的吸引力豈非大打折扣？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希伯（Charles B. Seib）的名言是：「我們大眾傳播媒介這一行喜歡競爭的衝突、緊張、及懸疑，因爲這些事情使我們的消息引人，所以我們喜歡它們。我們的信條是：“讓你和他打起來！”我們需要看到競爭。」〔註四十〕許多報紙的信條是：「讓反對的一方提出一個問題，然後引用他的話！」〔註四一〕客觀的批判這些話，簡直是興風作浪。固然吾人無法知道媒介本身腐化的程度，至少在缺乏「自我糾正」（self-corrective）的功能的狀況下，現在的決策系統在面臨媒介誇大事實的評論或基於私利的翻雲覆雨時，幾乎有束手無策的狼狽。由此觀之，媒介的自由權本身與決策系統的衝突即是不可避免的。

### 第三節 人性的不滿現狀所導致的媒介與決策系統的衝突

不滿現狀乃人性之一，它可以破壞現狀，也可以促進進步。吾人祖先因爲不滿意吃生肉，才用火來燒烤；因爲不滿意既存領袖，所以才有陰謀篡位；因爲不滿意遷徙流離，所以才有定居後的社會組織……總之，不滿現狀乃文明的重要成分。吾人關心的不是不滿現狀本身，而是它的表達方式及表達後產生的結果及影響等問題。到底「表達出來的不滿」有多少是「發洩即止」，多少是「要求得到方止」，或者爲間接表達與這個不滿本身無關的要求？其次，對既存價值的要求沒有獲得固然會引起不滿，期望升高（rising expectations）而導致的「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也是不可忽視的問題。這些根源於人性的不滿現狀的心態可謂千頭萬緒，欲詳加探討，實有賴科技整合的努力。

從政治社會學的觀點，不論是對客觀的事實或主觀的判斷的反應，人性的不滿現狀可能起源於一種「覺察的不公正」（perceived injustice）。這種「覺察的不公正」的程度固然因爲個人性格的不同而差別，客觀上也有其社會基礎，如勞力

分工（ *division of labor* ）、生產模式（ *modes of production* ）、價值物品及服務的分配（ *distribution of values, goods and services* ）等現象而產生的不平等。〔註四二〕 「覺察的不公正」是人類衝突行爲的心理根源之一，乃是人類社會發展必然的現象。幾乎從有史以來，人類社會一直企圖解決這個主觀甚於客觀的問題。如何建立可運作的管道，以緩和覺察的不公正所引起的不平等？這種追求產生了政治思想及制度的差異，也產生了差異本身所造成的衝突。

建立可運作的管道，使人類覺察的不公平能夠被妥善對待而不惡化爲激烈的破壞行動，這是每一個決策系統關心的重點。何以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大部分的時間仍處於相對的和平狀態（否則早就絕種了）？實歸功於某些可運作的管道，亦即帕爾森（ *Talcott Parsons* ）所謂的「系統適應」的結果。〔註四三〕 媒介即是近代政治系統中可運作的管道之一，使人民或利益團體表達不滿而不致於超越系統架構的限制。站在決策系統的觀點，由於不平則鳴爲人性不滿現狀的經常的行爲；站在人民群眾的觀點，決策系統所提供的現狀永遠不可能令人滿意；於是代表這種不滿現狀的具體化的媒介遂與決策系統極易處於衝突的狀況。這種安排係基於一個假設：人性難免不平而鳴，除非萬不得已，才會惡化爲鳴而攻之，採取激進的行動。所以儘管媒介與決策系統經常發生衝突，整體系統的穩定反而得以持續下去。

既使早在沒有所謂大眾傳播媒介制度的時代，聰明的決策者也會體察人性，默認這種心態，如中國古代子產的桑園論政的結構即是。反之，許多決策者曾企圖壓制不平之鳴，使人民的參與感減低至最低程度，極易導致系統功能的失調（ *dys-function* ）。馬基維里（ *Niccolo Machiavelli* ）是極爲了解這種情緒的政治學者之一。當他對君王說：「不要讓老百姓愛你，而要他們怕你！」他知道在不平則鳴的心理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後果。他說：「人民將較不猶豫地損害一個使自己被愛的人，而猶豫於損害一個使自己被怕的人。」又說：「當對他們有利的時候，老百姓將打破愛的聯繫，但一想到隨之而來的有效的處罰，便會三思而行了。」〔註四四〕 馬氏企圖解釋的是：當人民愛一個決策者，他們對他的期望及要求也隨之而至。如

果所期求的沒有獲得滿足而且永遠不可能滿足，人民便會有一種「被出賣」（**feel betrayed**）的怨恨感，怨恨一生，所採取的行動就可能超出不平之鳴了。反之，害怕固然使人民和決策者在感情上隔離，但是前者的要求也相對減少，使後者所建立的疏導不滿的結構較可以運作。

近代政治系統的制度化固然使決策系統與人民之間的關係較「非人地」（**im-personal**），人性的反應則大同小異。現代的人民雖然不見得害怕決策者「個人」，但是轉為害怕決策系統中的「角色」、「職位」或「法律」。非人地關係使人民不致於對決策者產生愛恨情緒及提出無止境的要求；同時法律又容許前者可以循一定架構發洩不平之鳴，一方面既可以減少人民因為不滿現狀而生的挫折感，一方面實際上可以增加系統的穩定性。

人性的不滿現狀固然從來有之，現代社會許多現象使這種心態更加嚴重。其中兩個很重要的是日益增加的求知慾與日益嚴重的疏離感，兩者都影響了大眾傳播媒介與決策系統的衝突。首先，現代人的求知慾可以說是科技進步的後遺症之一。亨利福特發明汽車以後的五十年之間，決策者幾乎從來不需要煩惱汽油或空氣污染的問題。僅僅在最近二十年之內，他們被迫解決能源危機、空氣污染、國際汽車工業之間的惡性競爭、工人罷工等危機。這些問題的產生可謂量多速快、內容複雜，決策系統能發現並瞭解者少，能採取實際行動解決者更少，往往是舊問題的本質尚不清楚，新的問題已經發生並且已經具有威脅性了。他方面呢？人民的耐性及馴服大不如從前了。由於知識程度普遍提高，幾乎人人都具有並且要知豐富的知識，知識越豐富，對決策系統也越苛求。媒介成為知識追求最省力及最大的來源，人民因受惠於它而更依賴它。根據一項統計，美國 CBS 鄧拉德（**Dan Rather**）的「60分鐘」的收視率高於「查理的天使」（**Charlie's Angels**）。〔註四五〕 以民國 69 年 7 月 12 日至 18 日台灣地區三台電視十大金榜節目為例，知識性節目佔近三分之一（法律劇場、天眼、六十分鐘）。〔註四六〕 甚至連學術節目如弗利曼（**Milton Friedman**）教授的「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也廣受群眾歡迎。這些



現象顯示現代的人民不但需要從媒介獲得聲色之娛，而且被時勢所逼（如謀生不易等）及意識的覺醒，更需要從媒介獲得知識及解決之道。

求知慾及對決策系統功能的不滿意使人民群眾極度依賴媒介，媒介也有反應地在探測並評估決策系統的表現，以便滿足人民的需要，遂使媒介與決策系統的衝突不可避免。不滿現狀導致批評，批評總是比解決容易。決策當局無論以「任何」方式來處理「任何」問題，媒介總可以發現「任何」缺點，用「任何」角度來批評。決策當局呢？限於財力人力及許多苦衷，確實也無法令媒介（以及群眾）滿意。令媒介也左右為難的是，它就算同情決策當局的苦衷而企圖替後者說話，常會引起人民的不滿；反過來，媒介如果太不同情決策當局，後者的制裁（如執照的審核及稅務問題）也使前者吃不消。因為求知慾而導致媒介與決策當局衝突的例子很多，舉其較突出的是1980年3月，美國聯邦法院判決禁止「進步」雜誌（*The Progressive*）出版一篇題為「氫彈秘密——我們如何獲得及為何揭露」的文章，這是美國新聞史上第一次政府當局以國家安全為理由「事先」干預出版自由權。「進步」雜誌堅持這篇報導的取材完全出於公開的資料，政府當局仍然成功地阻止該文的出版，理由是它可能幫助某些人在某地製造氫彈。〔註四七〕

不但在知識方面，在政治事務方面的求知慾更使媒介與決策當局發生衝突。現代人民幾乎都對政治事務懂一點，許多人更是自認為政論家或觀察家，要求更充足的訊息，並使自己成為當事者（*involved*）。這種太普及和太具要求性的求知慾給媒介極大的壓力。它不但要報導既存的事實，還要被迫去分析、預測、甚至於像治安單位一樣去調查一切政治事務活動，使決策系統極感到不安。在緊急狀態或非常時期，例如戰爭、選舉、或權力結構產生重大變化時期，媒介與決策系統的關係更趨尖銳化。流傳的笑話是：在黨政人事要調整時，欲阻止某人升遷的最有效方法是努力使他上報，把他捧為「內定」者。這類笑話的意義是：由於好奇心，一般人總是希望及早得知人事安排，因此媒介也非爭取這個訊息不可。但是決策當局也基於一個考慮：人事的決定必須盡可能冷靜、公正；如果媒介介入這種過程，一則隱含

候選人可能有操縱輿論之嫌，二則媒介可能企圖獲得利益。幾乎中外決策系統都不喜歡媒介這種未卜先知的預測。例如美國詹森總統最喜歡耍這種讓人莫測高深的遊戲。1965年，紐約時報專欄作家雷斯頓（ James Reston ）神通廣大地預先看到詹森數日後將在聯合國大會的演講，事關美國如何幫助聯合國財政危機，並將它披露出來。數日後，詹森在聯大如約演講，不但不提解決財政危機之事，而且提出完全相反的論調。又有一次，巴爾的摩太陽報將兩天以後白宮將正式宣布的一項「為和平捐糧」（ Food for Peace ）的計劃預先洩露，詹森居然憤而取消該計劃，且命令助理將印好之文件全部銷毀。〔註四八〕

類似以上的例子不勝枚舉，吾人的焦點不是放在媒介與決策系統誰是誰非，而是在衝突的不可避免性。尤其媒介常常「吃定」群眾求知的好奇心來操縱問題，群眾被擺佈而不自知。尤其一旦這些報導激發了群眾的「覺察的不公正」，決策系統往往遭受媒介與人民聯合起來的打擊。決策系統也往往先發制人，使媒介的運作陷入不順利。法國在阿爾及利亞及美國在越南作戰時，這類型的衝突極為明顯。

其次，現代人的疏離感也增加了他們對現狀的不滿及對決策系統的不信任（後者也導致前者），這種不滿和不信任會表現在媒介與決策系統的關係之中。在現代分化的社會結構（ differentiated social structures ）中，決策系統掌握著各種複雜的技術及龐大的人力財力以便推行各種業務，這種「經營」本身助長了決策系統的權威形象並且顯得無懈可擊。面對這種「社會國家化」（ n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的系統特徵，個人很自然地感到孤立無援，演化為一種疏離感。何謂「社會國家化」？即是，在過去，個人、公司團體或地方自治單位可以解決的問題，現在成為國家性的問題，只有用國家整體的力量才能解決，如種族糾紛、貿易衝突、都市及交通計劃設計等等。於是個人的能力顯得越來越微不足道，政府的能力顯得越來越無所不能。在這個狀況下，個人的不滿情緒經常不是出於自己的原因，也無法由個人解決，例如某家周圍黑煙籠罩，已經不是某家的衛生處理問題，而是整個環境污染的控制的問題。既然個人的問題的層面是全國性，那麼這個問題無法

解決時的不滿便針對國家決策系統；甚至連國家決策當局都無法解決時，這種不滿演化成爲疏離感。例如一項統計指出，1964~1974年之間，美國人認爲官吏不是善類的百分比從28%升高至45%，認爲政府被大公司控制的百分比從29%升高至65%。〔註四九〕

因爲對決策系統的失望而演化的疏離感常常導致一種犬儒式（cynicism）的虐待狂（sadism）。許多人往往對決策系統的成就寧願抱著懷疑或低估的態度，對於它的錯誤或失敗（即使是覺察或謠傳）則抱著寧可信其有的幸災樂禍的態度。這種心態表現在媒介的內容方面是喜歡看壞消息（只要自己不牽涉其中）或標奇立異的報導，往往對決策系統的表現的評估不夠客觀及善意，經常與當局發生衝突的關係。如果吾人追究其根源，這種衝突可以說是人性不滿現狀的具體化的現象。

#### 第四章 結論：今後的研究方向及重點

在民主政治的脈絡關係內，本研究已經簡要分析現代媒介在系統中運作的來源、方式、及功能，特別強調它以「第四分支」來彌補立法司法之不足，抑制決策系統的越軌。媒介以爲民喉舌的角色，一方面傳達非決策結構（包括媒介）的利益，成爲一種對決策系統的輸入或要求；一方面則提供知識，滿足現代人民的好奇心，以及充當合法的管道，使現代人對決策系統的不平之鳴有所發洩。在媒介功能運作的過程中，由於在角色方面與決策系統相異，衝突的關係遂不可避免，但僅限於系統的架構的範圍。

如何使媒介與決策系統在功能上增加協調（compatible）而減少衝突？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因爲太協調的狀況下，媒介就失去了它的存在的意義；但是衝突太大，却威脅了決策系統的能力及人民群眾的權利。吾人以爲欲解決這個複雜的問題，有必要就媒介結構的三種層次，作爲今後探討的重點：

第一個層次應將媒介的運作視爲政治系統內的「團體政治」（group politics）。即是，各利益團體在政治過程上互相競爭更多的價值，而和各次系統及系統整體

發生互動關係（互相依賴與衝突）。

第二層次可以將媒介整體視為一個獨立生存的系統，而將政治系統視為媒介系統運作的環境。在媒介系統之內，有許多次系統（以媒介的單位或以運作性質分類，例如以中廣自立晚報分類或是以記者印刷部門分類）在互動，有決策系統（行政院新聞局、文工會、記者公會等）在規範，以共同執行系統的模式維持、整合、目標追求及適應等。

第三層次僅是將「某一個」媒介視為獨立生存的系統（如中國電視台），媒介以外皆視為生存環境。在這個小天地之內，也有次系統的互動，決策系統與群眾的區分，「妥協」為其內部決策過程的特色。〔註五十〕

如何協調媒介與決策系統在每一個層次的衝突？本研究最大的貢獻可能是提出問題及建立假設，而不是提供答案及獲得通則，後者有待吾人繼續努力。吾人要強調的是概念的澄清：衝突的協調並非衝突的消除或防止，而是衝突當事者之間關係的正常化（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正如外交關係的正常化並非聯盟或永不衝突。關係正常化強調的是溝通管道（communication channels）的暢通，使衝突能夠循一定的運作架構解決。在正常化的前提下，衝突不致於惡化成為零數遊戲，合作不致於妨害功能的分化，系統的結構均得以平衡地、互相依賴地執行功能，人性的弱點也得到合理的安慰。總而言之，如果媒介與決策系統的互動關係順利，在溝通具有決定性重要的今天，系統整體的能力將大為增強。

## 註 釋

〔註 一〕 Melvin L. DeFleur, *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New York: Mckay, 1966).

〔註 二〕 Gustave Le Bon, *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13), pp. 60-105.

〔註 三〕 Ernest Barker, ed.,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16-137.

〔註 四〕 Will and Ariel Durant,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XI, The Age of Napole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5), p. 269.

- [註 五] 或許希特勒在實質意義上屬之，甚至拿破崙三世都不能列為平民皇帝。
- [註 六] Chalmers Johnson 以為系統功能失調 (dysfunction of the system) 以及中堅分子拒絕改革為革命的兩大起因。see Chalmers Johnson, *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System* (The Hoover Institute of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1964).
- [註 七] "The duty of a newspaper is to comfort the afflicted and afflict the comfortable." Robert Stein, *Media Power, Who Is Shaping Your Picture of the Wor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 p. 239.
- [註 八] Gabriel A. Almo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pp. 164-189.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1), CH. 1-2.
- [註 九] J. T. Klapper, *The Effects of Mass Me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1949), p. 3.
- [註 十] E. L. Hartley and R. E. Hartley, *Fundamentals of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Knopf, 1952), pp. 164-165.
- [註十一] For example, cf. Robert H. Keyserlingk, *Media Manipulation: The Press and Bismark in Imperial Germany* (Montreal: Renout, 1977).
- [註十二]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trans. Henry Reeve, ed. Francis Bowen (Boston: John Allyn, 1863), pp. 67-68.
- [註十三] 細節可參閱有關六〇年代末期反越戰活動的文獻。另外可參閱 Samuel Eliot Morison, Frederick Merk and Frank Freidel, *Dissent in Three American Wa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註十四] 這是傳統政治系統在面對科技優越的西方勢力時很自然產生的恐懼或自卑感。
- [註十五] 以中國與越南為例，大都市的少量中產階級也是在西方帝國主義入侵，摧毀了傳統的權威結構以後才逐漸發展的。可參考 John H. Kautsky *Political Change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New York: John Wiley, 1963), CH. 1-5. Robert L. Sansom, *The Economics of Insurgency in the Mekong Delta of Vietnam* (Cambridge: MIT, 1970).
- [註十六] Cf. Mark W. Hopkins, *Mass Media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raeger, 1970).
- [註十七] Lucian W. Pye, "Communication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sian Survey*, Vol. XVIII, No. 3 (March, 1978), pp. 221-246.
- [註十八] 國父全集，第一集，頁七十六。
- [註十九] *Time*, December 5, 1977.
- [註二十] For example, Bernard Berelson, Paul F. Lazarsfeld, and William McPhee, *Vo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 and others.
- [註二一] 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311.
- [註二二] Erich Fromm, *man for Himself* (New York: Avon, 1941), p. 68.
- [註二三] Marshall H.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an*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pp. 46-47.

- [註二四] 現代的選民就能夠成為獨立的個人，以問題立場 ( issue position ) 投票；而不像從前是政黨黨員，以黨提名或支持的人投票。所謂獨立包含兩個可能性，一是組織上他不屬於任何社團的一員，不受社團的指揮；一是他對所屬的社團的忠誠消失，跳槽 ( defect ) 到另外一個社團。當他成為獨立的個人時，他必須靠媒介所提供的訊息來形成他的問題立場。他以為這種立場是他「個人」發展出來的；其實呢？接受媒介影響的個人都與他的狀況一樣，大家不約而同的有一個立場模式。
- [註二五] Almond, *op. cit.*, p. 164.
- [註二六] *Ibid.*, p. 164 ff.
- [註二七] *Ibid.*
- [註二八] 例如他可能運用媒介，但是屬於買賣行為，媒介與他當選與否並沒有利害關係。
- [註二九] 在這個脈絡關係內，吾人可以解釋何以中國時報的余紀忠與聯合報的王惕吾被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
- [註三十] Karl W. Deutsch,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8), pp. 103-109.
- [註三一] *Ibid.*, p. 108.
- [註三二] 史記，淮陰侯列傳。
- [註三三] Julius Gould and William L. Kolb, ed., *A Dictiona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台北：馬陵，民國64年)，p. 187.
- [註三四] 所以有很多明智的評論家寧可繼續保持既存的崇高形象而不願意藉此轉換到不同功能的結構去，如美國的李普曼 ( Walter Lippmann ) 及克朗凱特 ( Walter Cronkite ) 等。反之，許多在野時的名士如羅斯陶 ( W. W. Rostow ) 一旦在狼狽的決策系統中脫身，竟不得再回母校 ( MIT ) 執教矣。
- [註三五] 在西方國家，每年有數十個高級軍事首長退休而轉往民營國防企業機構擔任要職。這種合邏輯的安排固然無可厚非，但方式是「退休前即有默契」？還是退休後「巧合地被發現而雇用」？這是一個奧妙的問題。所以許多學者，舉例言之如 Richard J. Barnet，指責美國軍事力量的擴張只是在推銷工業界的軍用產品。由於太多人民及太多地方依賴軍事工業為生，即使是民意代表也不願意多干涉，以免選舉時不利。
- [註三六] Robert Stein, *op. cit.*, p. 241.
- [註三七] 參閱 David B. 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New York: Knopf, 1951).
- [註三八] Doris Kearns, *Lyndon Johnson an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Harper, 1976), p. 246.
- [註三九] Bernard Rubin, *Media, Politics, and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4.
- [註四十] *Time*, November 19, 1979.
- [註四一] *Ibid.*
- [註四二] Barrington Moore, Jr., *Injustice: 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 (New

York: M. E. Sharpe, 1978), Part one.

〔註四三〕 Parsons, *op. cit.*

〔註四四〕 Nic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 (Baltimore, Md.: Penguin, 1972), pp. 95-98.

〔註四五〕 *Time*, March 27, 1978.

〔註四六〕 電視綜合週刊，第 225 期，民國 69 年 8 月 17 日，頁十六。

〔註四七〕 *Newsweek*, July 25, 1979.

〔註四八〕 Kearn, *op. cit.*, pp. 246-247.

〔註四九〕 參閱拙著，選民行為研究：心理過程上的幾個問題，南港，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專題選刊第十四號，頁三十五。

〔註五十〕 Cf. John W. Dimmick, "The Gatekeepers: Media Organizations As Political Coalitio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6 No. 2, April 1979, pp. 203-222.

